

区域文化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义乌建筑文化

上册

黄美燕 著 金福根 摄影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乌丛书

义乌区域文化丛编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义乌建筑文化

上册

黄美燕 著 金福根 摄影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任 盛秋平

第一副主任 林 毅

副 主 任 葛国庆 邵国龙 骆 亘 王 迎 (执行) 刘 峻

成 员 施文臻 朱有清 吴朝晖 金俊民 王永明 王建新

朱竣文 赵健明 黄旭光 楼小明 吴潮海

办公室主任 施文臻

办公室副主任 吴朝晖 金俊民

义乌丛书编辑部

主 编 吴潮海
副 主 编 施章岳
主 编 助 理 傅 健
编 辑 潘爱娟 赵晓青 孟祖平 陈金春
孙清土 金福根 李丽莉 楼向华
郑桂娟 吴雅珍 胡 莺
工 作 人 员 虞金法
图 片 编 辑 金福根

总序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小邹鲁”之称。自宋以来，县学、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土生其间，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并且，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有，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藪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概而言之,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义乌也同样,历代文士迭出,著述充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面临圯毁,因此,亟待抢救。如今,《义乌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通过影印整理,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使其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真可谓是两全之策,是为民族文化续命,是为地方文化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 在义乌历史上,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载入史册的却寥若晨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而,《义乌丛书》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 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天之本,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

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帮”对义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也成了《义乌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义乌丛书》对“文化”的界定，似乎介于广、狭之间，凡学术思想、哲学原理、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今，守望岁月的长河，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书》卷帙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走进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力量。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因而，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势的需要。

谨为序。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 盛秋平
义乌市人民政府市长 林毅

目 录

总序/001

第一章 义乌建筑文化发展史略/001

第一节 构木为巢到干栏木构（史前~战国）/002

第二节 筑台建屋与梁架木构（秦汉~六朝）/009

第三节 柱梁承桁与间架结构（隋唐~宋元）/017

第四节 雕梁镂窗与砖木结构（明清时期）/028

第五节 中西交融与外洋内中（清末民国时期）/033

第二章 传统建材与选材技术/041

第一节 材尽其用——选材原则/042

第二节 五材并举——材料类型/047

第三节 就地取材——资源分布/058

第四节 以材定分——材料利用/062

第三章 传统建筑类型与文化内涵/069

第一节 建筑的主要形式/070

第二节 城市建筑与城市演变/096

第三节 衙署学校与官场文化/113

第四节 市肆建筑与市井文化/133

第五节 厅堂建筑与民居文化/145

第六节 祠堂家庙与祭祀文化/158

第七节 寺观塔庙与宗教信仰/176

第八节 井桥码头与民生众相/190

第四章 传统建筑规划选址——风水与人居环境/219

第一节 建筑风水形势内容/220

第二节 老县城的风水格局/240

第三节 古村镇的规划格局/246

第四节 古村镇的风水实例评析/254

第五节 建筑风水文化评析/278

第五章 建筑意匠——传统建筑设计原理/281

第一节 建筑风格与屋样设计/282

第二节 建筑平面布局 and 空间利用/288

第三节 建筑整体构图/310

第四节 建筑结构与/设计/316

第五节 建筑反曲屋面与翼角起翘/318

第六章 传统建筑营造工序和技艺/325

第一节 营造工序与匠人/326

第二节 台基构造/340

第三节 大木构架/356

第四节 墙体与隔断/415

第五节 屋顶与椽望/426

第六节 阶基天井散水和甃地/434

第一章

义乌建筑文化发展史略

王室方多难，经营守汴都。

竭谋心报国，戮力愿擒俘。

落叶封苔砌，虚檐乱曙乌。

当时过河语，千载共嗟吁。

——丁存著：《题宗留守故居》

第一节

构木为巢到干栏木构

(史前~战国)

人类自蛮荒时代即有居处，“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①这段话被看作是关于中国建筑起源的基本理论。栋是指梁木，亦代表整个构架；宇，指一个封闭而有规限的空间。也就是说，人类在史前原始氏族社会，其聚落形式分南北差异，经历了野处穴居、半穴居或构巢以居的阶段，由此进化到地面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春秋时墨子也有一段相关的著名论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而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②。

^① 《易·系辞下》。

^② 《墨子》卷1，《辩过》第六。

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南方氏族部落的原始居住形态以巢居为主。巢居的木结构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围护结构，只是简单地用木料横架于树上，有如鸟巢一般。“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①。有巢氏的传说在先秦古籍已有记载，是传说中首创巢居的圣王。《中国民族史》云：“巢、燧、羲、农，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事迹较可凭信者，必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也。”据文献记载，巢居可能起源于南方。“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考其所以然者，盖地多虎狼，不如此，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②乐嘉藻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中认为，有巢氏构木为巢一说系周代附会，“居宅之近似于巢者，惟南方水乡有之。今南洋土人尚存此制。大江南北，濒水面居之人家，一面附于涯岸，一面则以甚长之木柱水际，此者可谓有巢氏之遗风，但皆非北方所宜有。其所以有有巢氏之一说者，大抵因周时文化及于江南。”^③事实上，南方土人是否曾经历巢居时代值得商榷。关于把巢居解释为“用木料横架于树上，有如鸟巢一般居住”的说法，我认为不合常理。一是架木于树并不安全，树上有虫蛇出没，且架木于树并不能抵挡野兽入侵，再是因无围护墙，无法抵挡风霜雨雪等恶劣的天气。二是从技术上推断应有更合理的做法。我以为，人类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垒石成墙，架木为构，将檩条直接搁在墙上，通过绑扎技术搭建单间的坡屋顶茅草房屋是最为简单易行的。如果有木板，夯土成墙也是易于完成的。这种简易的建筑，连同墙与屋顶不相分离的茅（草）屋顶窝棚式建筑，在20世纪义乌农村仍随处可见。故此，我认为原始的巢居形式可以理解为是墙体与屋顶不相分离的窝棚式居住(棚居)，类似看瓜棚，而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架木于树、似鸟巢般居住的原始生活方式。

建筑史学界一般倾向认为，干栏式建筑是由原始巢居演变而来的。若据此推断，南方巢居时代早在有巢氏之先，长江中下游考古文明足以证明这一点。浙江境内连续

①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② (南宋)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卷4，“巢居”。

③ 乐嘉藻著：《中国建筑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页。



1-1-1 桥头出土的9000年前环壕聚落遗址。



1-1-2 义乌绣湖广场工地出土的汉代鬻鬻纹瓦当。



1-1-3 绣湖广场工地出土的汉代如意纹瓦当。

发现河姆渡文化、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等新石器早、中期史前聚落遗址，遗址中均有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发现。义乌桥头遗址的发现(如图1-1-1)，将史前文明上溯至距今约9000年的上山文化晚期。当然各地的发展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

义乌地处金衢盆地，靠近东南沿海，地形以中低山丘陵为主，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卵石、块石、木料随处可得，垒石为墙、架木为构是十分便利的。在20世纪各个不同时期，曾在义乌境内采集到石斧、石锛、石钺、穿孔石刀、石箭簇之类的新石器。

2000年5月，在义乌旧城改造绣湖广场建设工地中，挖地深达10米以上，其中文化堆积层深达五六米，地下街道上下叠压有3层，在金山岭小山坡下发现古井群，共计20多口，秦汉时期井群就有12口，还有一口春秋战国时期的水井，采用井干式木构架，四边采用四根木条半榫连接，其形制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水井相仿。从井内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细方格印纹红陶罐。建设工地因用挖掘机作业，文化堆积层被严重扰动破坏，留下许多遗

憾。有人在现场捡到汉代如意纹瓦当和饕餮纹瓦当各一枚（如图1-1-2、1-1-3），并且看到数枚巨型动物的牙齿，动物骨骼以牛的肩胛骨为多。在堆积层下面还发现一排木柱桩，柱桩与柱桩间距1.2~1.5米，计有10多根，柱桩径约0.11米，这很可能是史前聚落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遗址的柱桩。

2000~2001年，在距义乌城区不足20公里的浦江县浦阳江上游黄宅镇渠南村查塘山发现了距今约11000~8600年的上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证明，上山文化源于新石器早期文明。一万年前的智慧的上山人不但已开始定居生活，还创造了高度的稻作农业文明，开始生产和使用陶器。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万年柱洞等建筑遗迹。遗迹第三层下发现的一号房址（F1）有明确的结构单元，柱洞分3列，长14米，呈西北—东南走向，这类建筑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相类似，专家判断为干栏式建筑的柱桩洞遗迹。由此分析，上山人很可能已经开始采用简单的木、石、骨制工具，伐木采石，以粘土、木材、石头和茅草等为建筑材料，建造干栏式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告别了巢（棚）居生活。近些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境内发现了一系列史前考古遗址。

上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为义乌历史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浦阳在汉代时称新阳乡，在乌伤境内，有一则历史资料可资证明。“杨璇，字机平，会稽乌伤人也。高祖父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①民国《浦江县志》也有相关的记载，秦置乌伤县，浦阳应在乌伤境内。后浦阳行政管辖上虽有变化，曾一度隶属于诸暨，但不管怎么说，今上山文化遗址所在区域曾经隶属于古乌伤的事实毋庸置疑。“天宝十三载（754），分（乌伤）县地置浦阳县，即今之浦江也。”^②

旧志称，义乌唐虞属《禹贡》扬州之域，当时定居的土著居民被称为山越，他们是一些崇拜太阳并以鸟为图腾的百越鸟夷族，江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点。早在新石器时期，他们就在此定居。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夏禹六世孙封庶子无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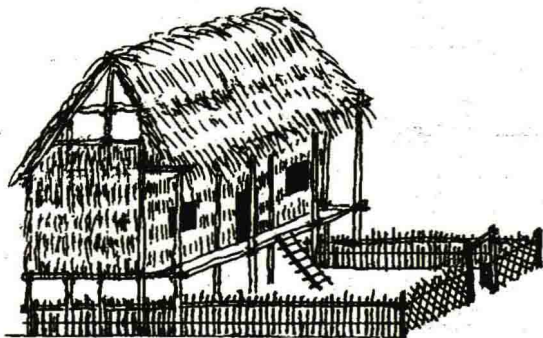
①《后汉书》卷68，“杨璇传”。

②明万历《义乌县志》卷2，“方輿考”，“建置”，第2页。

于会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於越，以守禹冢。”^①越国之称始此。当时於越的疆域，包括东南沿海的广大区域，因邻近东海，是太阳最早从海平面升起的地方。

义乌先秦时期号称句无，是於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与史前跨湖桥文明、河姆渡文明同属于越文化区域。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同一区域的人类早期文明是十分相近的。也就是说，浙江境内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发现，同样可以为义乌的史前文明提供相关的佐证。

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8000~7000年前，东南沿海发生一次惨烈的海侵，海水倒



1-1-4 原始荆芭抹泥墙茅草顶干栏式建筑模型。

灌，东南沿海成为一片汪洋，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河姆渡、跨湖桥遗址就是在这次海侵中淹没的城址。

义乌的建筑文明起源与上山文化、河姆渡、跨湖桥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有着同宗同源的关系，因此，全面介绍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建筑情况，有助于了解义乌史前时期的建筑文明。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干栏式建筑，它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发现最早。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结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如图1-1-4：原始荆芭抹泥墙茅草顶干栏式建筑模型）。义乌现还偶见的简易茅草披屋顶瓜棚式建筑，

^①（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越绝卷》第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是农村最低廉的临时性建（构）筑物，可看成是早期茅草坡屋顶地面建筑的遗绪。

干栏式建筑是与江南的地理、气候和物质条件相适宜的一种经过长期发展的木构建筑。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首先，背山面水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建造干栏式建筑。江南多低山、丘陵、湖泊，早期居民往往选择背靠山坡，前临溪（湖）水的环境定居。《吴越春秋》关于於越人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弗（同“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①。由此看来，越人的生活来源除依靠发展稻作农业，还辅之以采集和捕猎。因此，越人习惯依陵陆、近水源而居，这种背山面水、通风受阳的丘陵地形，干栏式建筑既可减免填土、挖掘之劳，又可避免汛期雨水的浸泡。除了干栏木构建筑外，也很适于在台地上建造地面建筑。

其次，下面立柱桩上铺地板的建筑形式，地面上通风凉快，可防闷热潮湿，也可防止低飞的昆虫聚集。残余的抛弃物还可从地板空隙掷出，随水漂流。另外，在陆上的干栏木构建筑，底层用于圈养牲口。这种生活居住形式，在我国贵州、云南等南方地区沿习至今。

第三，干栏式建筑选材多用竹、木材，这与江南森林茂密，竹、木材资源丰富的物质便利条件相适应，有利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些工具，有凿、锥、锯、匕和针等，大都用兽骨制成。从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桩柱、立柱、梁、枋、板等建筑木构件，其中不少构件上有加工成多种类型的榫、卯（孔）、企口、梢钉等，如榫头有方榫、圆榫、双层榫，卯口也有方圆之分，加工比较细致，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发展。考古发现证明，当黄河流域还处于绑扎技术阶段时，长江流域已使用建筑工具，采用榫卯连接技术。据河姆渡发现榫卯与企口板等木构件来看，当时很可能已使用铁制的建筑工具，由于生铁易于朽烂，未能保存下来。除此之外，遗址中所发现的两种木构连接法，令人惊叹不

^①（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